

本集刊为中国知网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七辑)

主编：罗选民

07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亞太跨學科
翻譯研究

(第七輯)

主編：羅選民



07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第七辑 / 罗选民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02-52619-3

I. ①亚… II. ①罗…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918号

责任编辑：刘细珍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宋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2.25 字 数：223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00元

产品编号：078737-01

主办单位 / SPONSORS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主编 / EDITOR IN CHIEF

罗选民

副主编 / ASSOCIATE EDITORS

张旭 李伟荣

主编助理 / EDITORIAL ASSISTANT

李文婕

编委 / EDITORIAL BOARD

Anthony Py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Bao Chuanyun,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USA
Edwin Gentzl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USA
Frank Austermuehl,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Henrik Gottlieb,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Isabelle Rabut,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France
Jeremy Munday, University of Leeds, UK
Lawrence Venuti, Temple University, USA
Luise von Flotow,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G. Watson,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Phrae Chittiphalangsri,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Robert Neath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Vicente Rafa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Xie Shaobo,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Zheng Binghan, Durham University, UK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刘树森, 北京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单德兴, 台湾中研院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仲伟合, 澳门城市大学

编者的话

本辑是《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第七辑。除一贯关注的中国文学外译议题之外，本辑中还增设了一个新的栏目——“汉学家典籍翻译研究”，用以回应近年来越来越受国内学界关注的国际汉学研究。已有的研究揭示，中文典籍翻译是海外汉学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许多汉学家在其学术生涯中不约而同的选择。这充分说明翻译活动对于海外汉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辑所设的“汉学家典籍翻译研究”栏目，希望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翻译研究视角，在扩宽其学科视野的同时也丰富翻译研究中译者研究的成果。

本辑共收录 12 篇论文，设五个栏目：集刊特稿、理论探讨、案例分析、汉学家典籍翻译研究、学术动态。

本辑特稿为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教授陈德鸿的文章《阅读全球：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与“村上春树翻译现象”》。本文探讨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中译本如何获得空前成功、在华人世界里广受欢迎。与此前大多数此类研究不同的是，陈德鸿的研究聚焦大众读者对于翻译文学的接受，并进一步探讨了大众读者的接受对于一部翻译文学作品的传播广度与热度的影响。通过读者在互联网写下的短言片语，该研究讨论了村上小说译本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读者群特点及其为村上春树中文译本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最后，陈德鸿指出，实际上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村上春树小说译本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前所未有的热度。村上春树的小说译本之所以非凡，不仅是基于销量和地缘上的传播范围的判断，也包括这种影响势头所持续的时间。“村上春树翻译现象”告诉我们，只要原作不断被翻译、出版，并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获得解读与接受，其影响力就会持久不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接受过程中，个体因素和集体因素一旦形成互补，译作就很有可能迅速畅销。鉴于翻译研究界以往并未将重点放在读者个体对翻译小说的接受上，陈德鸿的这一研究也旨在引发学界对于个体因素在翻译接受与传播中的作用这一议题的更多重视。

理论探讨栏目中收录了付添爵与张思永的两篇文章。付添爵认为历史、文化记忆与翻译存在一个彼此联成、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他的研究比附中国成语“郢书燕说”，认为翻译中望文生义型的阐释或托古改制式的主张都会导致译文与原文意义有所出入甚或大相径庭。但他认为经由翻译活动而产生的“郢书燕说”式的效果，

有时虽错亦得，常常折射出历史语境影响下的一种别样叙述或塑造方式，即主观性的思想阐释（解释），而在翻译中这种阐释俯拾皆是。作者在文章中试图理清历史、文化记忆与翻译三者之间的内在脉络，论述历史如何通过文化记忆进行重构与塑造，文化记忆本身如何蕴含有翻译属性，二者如何共生互促、建构历史形象，以及历史、文化记忆与翻译结成了一个怎样的共同体。同时，作者还指出，历史、文化记忆与翻译三者之间的休戚与共不仅为翻译学科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让译者多了一份文化担当与历史责任。在《西方译论在中国：影响阶段与接受效果分析——基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鸟瞰式考察》一文中，张思永指出中西译论的影响研究是探究中国译学建设历程的重要维度。他通过考察中西译学史发现，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西译论基本上是在各自的轨道上平行发展的。之后，中西译论就断断续续产生了交集，并且更多地体现了西方译论对中国译论的单向影响。该文章首先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视角对这一过程的影响阶段和接受效果做了鸟瞰式的考察和分析，划分出这一影响的三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用图示法描述西方译论对中国译论的影响关系。然后，作者从共时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语境下对西方译论的两种接受模式，并归纳其相应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最后，文章指出中国译论应在继续引进和吸收西方译论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译学传统和当前的翻译实践，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译论并为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案例分析栏目共收录四篇论文。其中张旭的研究以黎翠珍英译《香港礼宾府》为个案，讨论了她是如何协调充分性规范和接受性规范，进而在重写过程中做出种种创格举措，使译文在西方世界有很好的接受效果。张旭指出，以汉语为母语的外译活动译者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等因素的考量，在翻译时常抱有患得患失的心态，总是想将中国文化的内容充分传译出去。在此类翻译目的的指导下，译者常在不经意间忽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所生产的译文与目的语读者产生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隔膜。这使得此类译者虽充当了现代“通事”的角色，但无法实现交流中“通心”的目的。因此，黎翠珍英译《香港礼宾府》的个案，很好地示范了如何在文化外译活动中兼顾文化传播与读者感受，创作出读者友好型的译文。张跃军的文章《诗歌翻译新模式——读〈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描述、讨论了《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英译过程中的中外合作模式，介绍了该项目多元互补且具深厚狄金森研究学养的中外译者队伍是如何一方面将狄金森研究的最新视角与成果熔铸于译文中，而另一方面又充分关照读者需求，在体例及副文本编排方面为读者提供丰富的背景资讯，为其理解、欣赏狄金森诗作提供有力支持的。作者认为，《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的翻译以狄金森研究最新

成果为基础，整合了源语与目的语文化的特色，故而创造出了一种成功的“合成文本”，也提供了一种诗歌翻译的新模式。近年来，随着武侠小说这一独特的中国文学类型在世界范围传播热度的升高以及越来越多武侠小说外语译本的出版发行，关于武侠小说译介的研究正得到更多的关注。但吴侃与李德超两位学者认为，目前对武侠小说译介的研究大多基于传统的文本或文学分析定性方法，主观色彩较强。因此，他们在自建“金庸小说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及定量方法，从词汇丰富度、标准化词类分布、高频词重合度及武侠名词归化率等几方面对金庸小说三大英文全译本进行词范化研究。他们发现，闵福德译的《鹿鼎记》词范化程度最高，海外接受度亦最高。莫锦屏译的《雪山飞狐》词范化程度适中，海外接受度却最低。晏格文译的《书剑恩仇录》词范化程度最低，海外接受则呈两极化。基于此发现，作者提出，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策略决定了这三大译本的词范化程度，这种词范化程度，连同其他影响因素在内，是影响译本在英文读者市场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剖析翻译动机与策略、译本词范化、译本接受三者之间的关系能为现阶段中国武侠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带来启示。《孙子兵法》英译历史久远，各家译本层出不穷。张琳瑜与李孟端的研究基于多元系统论，通过运用统计分析和实例论证的方法，描述了四个英文译本（Samuel Griffith 译本，林戊荪译本，Thomas Cleary 译本和 John Minford 译本）的翻译特色。同时，他们的研究还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了各个时期的译本成因，将之与译本的特点相结合，分析、总结了《孙子兵法》英译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揭示西方读者对中国典籍阅读需求的变化过程。张琳瑜与李孟端希望此类研究可以指导现阶段典籍外译事业，帮助译者适应不断变换的海外市场。

本辑新增汉学家典籍翻译研究栏目并且收录了三篇相关文章。其中陶友兰的文章从选词、构句、逻辑、文化专有项的归化简化处理、考证溯源求创新五个方面，对汉学家西蒙·利斯的《论语》英译本进行了评鉴，全面分析了其译本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译本中尚存的问题。结合译本特点，陶友兰指出，西蒙·利斯的《论语》英译本深受英语读者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兼顾了学术性和通俗化，用词地道，译文简洁优美、通顺流畅，在注释中旁征博引，贯通中西，从现代视角表达他对自己参悟的儒家思想本质的诠释。反观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典籍的历程，作者认为，西学东渐走过的一条接受之路就是先接受意译作品，再追求直译作品。而如今，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活动应该也会经历一个类似的阶段。据此，作者进一步指出，要在西方普及中国典籍，利斯的“作家型翻译”虽倾向于意译，却仍不失为值得推荐的好方法。王银泉的研究首先梳理了以利玛窦 1582 年抵达澳门为肇端，直至被称为

“最后的耶稣会士”的钱德明 1793 年在北京去世这 200 余年中耶稣会士在华的翻译活动。他指出，由于认识到双向交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以利玛窦为首的身兼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儒家文化研究者双重身份的汉学家们，同时致力于“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中国文化更顺利地接受天主教义，利玛窦等人在译介活动中着意使天主教义附着于儒学，即通过西方科学与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会通，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与好感，以此推进福音传播。这种“适应性策略”使得他们的在华传教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文化科技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在 17—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到达高峰。本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对斯奈德的汉学译介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作者许明与牛荣亮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对斯奈德的研究多集中在生态思想及生态诗人身份上，对其译介活动和成就的关注明显不足。然而，斯奈德先后将 24 首寒山诗和 17 首唐诗推向英语世界，其所译寒山诗更是入选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选集》），完成了经典化过程。因此，对于斯奈德的研究应该是汉学家翻译活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主题。许明与牛荣亮的研究首先对斯奈德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禅宗修行和生态佛教思想进行了梳理，接着结合相关的文本分析，对其近 50 年的汉学译介做了全面回顾和考察，对他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成就做出了客观的描述和评价。对斯奈德译介活动的整体考察，有助于我们对其汉学研究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化外译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思考。

最后，在本期学术动态栏目中，孙雨对戴光荣所著 *Hybridity in Translated Chinese: A Corpus Analytical Framework*（《汉语译文糅杂特征研究：语料库分析框架及运用》）一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此外，孙雨还指出，自从 Mona Baker 提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CTS）以来，语料库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子领域，CTS 不仅是对翻译的定量描述，而且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假设（如翻译共性）、新的研究方法（如译者风格），并开发了新的工具（如计算机辅助翻译培训），成为新意层出的翻译研究领域。而戴光荣的新书，则是第一本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来探索翻译汉语译文糅杂特征的书，推动了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耿强的述评文章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Writing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则对 2017 年出版的《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邹振环著）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在介绍了《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各部分的主要内容之后，耿强指出，该书明确提出建构翻译史学史的学科框架，对中国翻译史研究在理论、方法和材料方面都有不小的贡献。同时，作者也在文中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一些缺憾，

即作者更多站在史学学科立场，未能与翻译学学科形成对话，在梳理民族语翻译史研究中未能收录一些重要史料，以及于翻译史学史框架方面仍留有很大补充空间。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作为第一个全面、系统梳理 20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学术发展史的成果，邹振环的著作仍对翻译史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从本集刊特稿以及其他栏目收录的多篇文章可以看出，“接受”正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热词，这个研究热点不仅是由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策所引发，更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翻译活动与社会其他系统间存在活跃、持续的交流，从而使翻译研究的视野逐渐与其他学科视野融合、交叉而形成的。在此，我们要感谢各位作者对本集刊学术宗旨的认同与信任，将他们的最新思考与成果托于本集刊发表。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同道中人为我们的集刊赐稿，共同建设这个跨学科学术平台。为此，本辑的“邀稿通知”提供了详细的投稿信息。最后本集刊编辑部还要感谢为本辑出版付出极大的心力和时间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刘细珍副编审以及本集刊的主编助理李文婕博士。

主编：罗选民

2018 年 12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v

集刊特稿

陈德鸿

阅读全球：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与“村上春树翻译现象” 1

理论探讨

付添爵

历史·文化记忆·翻译：从“郢书燕说”谈起 27

张思永

西方译论在中国：影响阶段与接受效果分析

——基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鸟瞰式考察 43

案例分析

张 旭

从“通事”到“通心”：细读黎翠珍英译《香港礼宾府》 61

张跃军

诗歌翻译新模式

——读《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 83

吴侃 李德超

基于语料库的英译金庸小说词范化研究及启示 93

张琳瑜 李孟端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孙子兵法》的英译变迁 107

汉学家典籍翻译研究

陶友兰

雅俗共赏，贯通中西

——西蒙·利斯《论语》英译本特色评鉴 118

王银泉

适应性传教路线与利玛窦儒学化翻译研究 136

许明 牛荣亮

翻译家加里·斯奈德的汉学译介考论 147

学术动态

SUN Yu

Book Review of *Hybridity in Translated Chinese: A Corpus Analytical Framework* 165

GENG Qiang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Writing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170

邀稿通知

阅读全球：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与“村上春树翻译现象”

Reading the Global: The Reader-Consumer and the Murakami Translation Phenomenon

陈德鸿
Leo Tak-hung CHAN

摘要：

20世纪90年代，村上春树的小说产生了涟漪效应，在东西方读者群中大受欢迎，这一现象后来被冠名为“村上春树现象”。本文主要探讨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中译本如何获得空前成功、在华人世界里广受欢迎的。作者通过读者在互联网写下的只言片语，讨论村上春树小说译本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读者群特点。

关键词：

村上春树；全球化；大众读者；《挪威的森林》；互联网

Abstract:

In the 1990s, the novels of Haruki Murakami were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readers, leading to what was later called “the Murakami Phenomenon”. The present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and popularity of his novels wh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examining the comments posted online by readers, the author seeks to characterize the Murakami reading communiti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SAR and Taiwan.

Key words:

Haruki Murakami; globalization; mass reader; *Norwegian Wood*; Internet

1. 引言

如今，电影电视等视觉传媒已经非常普及，配音和字幕可以轻松克服语言障碍。有鉴于此，人们不免会问：为什么翻译小说还能持续不断地在全球出版，且数量还与日俱增？（参见 Dixon 1998: 1343-1348）尽管翻译小说有时不免沦落到边缘地带，但它们毕竟是流行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而这一显著的事实或许并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奇怪的是，翻译研究界也没有学者探讨过为什么翻译小说会有如此大的读

者群。出版社每年都出版大量的翻译小说，书店也有大量翻译小说上架，而翻译小说荣登畅销书榜单的事情也并不罕见。鉴于这种情形，我们是否探讨过翻译小说为何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否思考过为何读者会购买翻译小说？前人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通俗小说的接受情况，比如针对伊恩·佛莱明（Ian Fleming）和伊妮德·布来敦（Enid Blyton）小说的研究（Druce 1992），但是从没有人对翻译小说进行类似的研究。那么，原版小说和翻译小说的流行情况究竟是否有本质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村上春树（1949—）小说的中文译本大受欢迎，以该现象作为试验案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读者大众是如何接受这类翻译小说的。

翻译小说的大众接受研究严重滞后，原因之一是出版社提供的销售数据非常有限；其二是相较于精英读者这一概念，大众读者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就第一条原因而言，出版社了解准确评估读者品味的重要性，因此一本翻译小说出版与否，离不开出版社对译本销售预期做出的判断。当然，出版社也不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许多出版社与学术界和教育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总体而言，出版社不愿过多透露销量和印刷数据，但如果缺少这些数据，研究者要想评价某个译本的接受情况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知道，政界经常会以民意调查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状况。然而在阅读界，对读者品味和阅读偏好的数据调查却微乎其微。¹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数据，是1996年“英国连锁书店沃特斯通和英国第四频道公司关于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的调查”。（Bloom 2002: 248-249）在该调查列出的84部小说里，有13部是翻译小说，这说明翻译小说的接受情况并非全然不佳。²如果和1932年利维斯（Q. D. Leavis）的书单相比，则更能说明这一现象。然而，利维斯并没有解释她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只在她的开创性著作《小说和读者大众》里列出了逾百部18世纪至20世纪的畅销小说。这个列表里只有3部是翻译小说，分别为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的《犹太人苏斯》（1927），巴古拉·达诺的《理智的泪水》（1773），以及《一千零一夜》（1708）。就准确性而言，利维斯的结论虽然值得怀疑，但至少说明了几百年来翻译小说愈发受到欢迎这一事实。无论如何，基于利维斯等开创者的研究，近年来对于流行小说读者群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Littau 2006; Bloom 2002; McCracken 1998）而现在轮到了翻译学者登场，在充分借鉴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来分析翻译小说的接受情况。

在讨论之前，鉴于文学批评领域对“读者”有很多不同的界定，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不同类型的读者。首先，作为畅销书，村上春树小说中译本的成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文本特点被边缘化了，人们不再认为它可

以决定翻译小说的接受情况；因此，我们需要着重了解特定读者群的阅读习惯以及阅读选择。此外，“大众读者”（mass reader）这一观念之所以凸显出来，原因很多。把“大众”纳入研究视野，实际上是紧随当代精神，而当代精神是由大众消费、大众生产和大众交流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我们考察村上春树小说中译本的成功，必须从“大众”的“众”字出发的。此外，“大众”这一概念还暗含着消费者行为中的诸多非理性因素：由于在阅读倾向上盲目跟风，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人的（错误）引导。例如，很多中国读者直言，他们之所以买村上春树小说的中译本，是因为“人人都在谈论村上春树”。这一事实显然与文学评论家的惯常思维相去甚远，因为他们通常是基于读者能力的设定来为翻译小说创造并建构意义的。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简要了解“大众读者”的概念。为了避免掉入理论的泥淖而偏离本文的重点，笔者无意给“一般读者”（common reader）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众读者”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这一说法因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这两位作家而为人熟知。他们认为，“一般读者”（评论家以外的人）是指有智慧、有能力做出常识判断的读者。相比之下，“大众读者”是底层的草根读者，他们喜欢流行、畅销的读物，比如通俗小说。（参见 Atler 1998: 25）需要澄清的是，本文使用的“大众读者”概念是和安特勒的用法相一致的，而非卡尔顿的用法。此外，在接下来要讨论的案例中，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在东亚国家此类大众读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庞大，但 20 世纪 90 年代村上春树现象出现时，读者数量之大一定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大众读者”这一概念对于本文既适用，也中肯。和苏联的大众读者不同，本文的“大众读者”不是完全被动的，也不是可以轻易被骗的：尽管针对村上春树的小说褒贬不一，但其读者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文本鉴别力。或许有人会批评本文对“大众读者”的界定模糊，认为这种解读的应用价值非常有限，对此，本文想借卡尔顿的观点作为回应：“鉴别读者或消费者的方法就像是对游离不定的身体进行思考，并分条缕析地列出思考的内容，但这种思考和身体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Carleton 1995: 17）

本文探讨的案例包含村上春树最有名的中译本，尤其是《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两部。³ 20 世纪 90 年代，村上春树的小说产生了涟漪效应，其译本在东西方读者群中影响颇深，这一现象后来被冠名为“村上春树现象”，本文将在下一小节中对其进行讨论。笔者将分别描述村上春树小说译本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等英语国家的读者群特点，因为村上春树的小说几乎是同时介绍到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有学者用不同的解释框架来分析村上春树小

说译本的成功原因，比如全球化、区域化以及中日关系等，而本文将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解释框架，强调常见的误区，以揭开这些译本大获成功的深层原因。同时，本文也会着重探究 21 世纪以来的新的阅读模式。由于村上春树小说译本的大受欢迎，读者和译作的互动关系明显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翻译中的二元对立思维（熟悉 vs. 陌生，本土 vs. 外来）也在不断得到改善。总而言之，本文旨在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读者群，以期为探讨翻译小说的接受问题带来新颖视角。

然而本研究也面临多项棘手的难题。首先，人们一般认为，身处不同地理位置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反应是不同的。但据此我们很难解释为何村上春树的小说不止在东亚广受欢迎，在太平洋两岸亦是如此。有鉴于此，要想用一种普世的观点来解释村上春树的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原因，看来并不容易。村上春树小说译本的众多读者（不包含日语原文的读者），能否就其小说引人入胜之处达成共识？第二，尽管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作为小说消费者的读者身上，但我们一定不能罔顾这样的事实：读者群也包含译者、文学评论家和出版人，他们影响着其他读者对翻译小说的接受情况。那么这些人是如何促成“村上春树现象”形成的？第三，我们必须把对“村上春树现象”的考察置于对 20 世纪末的读者群的整体考虑之中，彼时的读者品味已经趋向成熟和老练，而这种品位很大程度上是在欣赏原语文学过程中形成和夯实的。村上春树小说的译文读者远远比利维斯在 80 年前做的那项统计的人数要庞大得多。如今，一本小说在其出版之后的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内就可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于是读者群也会随之迅猛增长。村上春树小说译本的出现比 J. K. 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还要早 10 年，其受欢迎程度在人类阅读史上是令人惊讶的。

2. 大众读者和村上春树小说的译本

与美国的接受情况相比，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则要复杂得多，牵涉的因素也更加多样，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 20 年间，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的接受涉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三个地区的读者。一开始，台湾地区的读者对于阅读村上春树的小说并不积极，但读者的热情一旦激起，就如同滚雪球般越涨越高。香港地区的读者是在台湾地区读者接受之后才开始逐渐接受村上春树的，但就译本而言，他们有广泛的选择，除香港地区本地译者的译本外，他们还可以从台湾地区已有的中译本里尽情地挑选。与前两者不同，大陆的读者经历了短期的温热之后，对这位日本小说家的喜爱呈井喷式增强。于是，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在上述三个地区都家喻户晓了。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日本引起巨大反响，超越了村上春树本人的其他所有作品，成为超级畅销书。

赖明珠被誉为“翻译村上春树的权威台湾地区译者”，她早在 1986 年就翻译了《1973 年的弹珠玩具》，由中国时报出版社出版。然而，直到 1989 年故乡出版社出版了《挪威的森林》中译本，村上春树才在台湾地区迅速走红。这个译本是由刘惠禎、黄琪玟、傅伯宁、黄翠娥、黄钧浩等人合译的。该译本出现时，《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刚刚盛行不到两年的时间。然而，村上春树之所以在台湾地区大受欢迎，赖明珠的翻译之功绝对不可忽略，她以一人之力翻译了村上春树的所有小说（参见表 1），其中有 5 部都登上了诚品书店畅销书前百名。据诚品书店的市场经理 Lin Yu-hui 称，《海边的卡夫卡》中译本在 2004 年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和《数字城堡》等在销售市场上同样大获成功的翻译小说。（参见 Singh 2005）

表 1 村上春树小说在台湾地区的译本

出版时间/年	中译本名称	译者	出版社
1986	《1973 年的弹珠玩具》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88	《听风的歌》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89	《挪威的森林》	刘惠禎等	故乡出版社*
1991	《舞舞舞》	张怀民等	故乡出版社*
1992	《挪威的森林》	林少华	可筑出版社*
1993	《国境之南·太阳之西》	可钟，傅君	故乡出版社*
1994	《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95	《寻羊冒险记》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95	《发条鸟年代记》（第一部）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95	《发条鸟年代记》（第二部）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96	《舞舞舞》**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97	《发条鸟年代记》（第三部）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97	《挪威的森林》**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1999	《人造卫星情人》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2001	《国境之南·太阳之西》**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2003	《海边的卡夫卡》	赖明珠	中国时报出版社

*未经作者允许的非法出版

** 赖明珠的重译本

（注：所有的出版时间都是该译本出版的已知最早年份）

值得注意的是，赖明珠的译本同时也造就了 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地区的“村上春树热”。她的译本在香港地区由博益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隶属于《华南早报》的出版社，专精于流行读物的出版，该出版社出版的“村上春树小说译丛”共有 20 本，其中部分译本为叶蕙所译，包括《挪威的森林》（1991），《寻羊的冒险》（1992）和《舞舞舞吧》（1992）。其中《挪威的森林》一经上架，就被抢购一空，10 年之内重印多达 22 次。叶蕙和赖明珠一样都是多产的翻译家，参与翻译了超过 100 部的日本小说。她主要翻译的是赤川次郎的侦探小说，而她翻译的《挪威的森林》在 1991 年曾连续数月占据多种香港地区畅销书的榜单。当然，她最成功的译本是《世纪末日与冷酷异境》，该译本曾在 1994 年的 6 月一直到 10 月连续 5 个月被列入《亚洲周刊》的畅销书单。

在中国大陆，据林少华所言（亚思明 2006），尽管《挪威的森林》中译本早在 1989 年就已经出版，但直到 1998 年之后才获得轰动效应，当时该译本的封面得到了重新设计，用纸也换成了质量较好的纸张。该译本两年之内售出 20 万册，到了 2006 年已经达到 140 万册，这使得该书成为有史以来销售最好的中文译作。⁴因此，经过 10 年的慢热，“村上春树现象”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中国大陆的图书市场蔚然成风，但这比港台地区整整晚了 10 年。林少华当时不仅是 8 本村上春树小说的译者（见表 2），同时也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他还翻译过其他当代日本作家的小说，包括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和《潮骚》。林少华翻译的《挪威的森林》两年内被重印了 16 次，同时在 2003 年到 2004 年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了 26 万册《海边的卡夫卡》中译本，“村上春树现象”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据估计，截至 2002 年，村上春树小说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已经销售了 150 万册。（参见 Lo 2004）⁵

表 2 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本

出版时间/年	中译本名称	出版社
1989	《挪威的森林》	漓江出版社
1992	《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	漓江出版社
1996	《舞！舞！舞！》	漓江出版社
1997	《寻羊冒险记》	漓江出版社
1997	《奇鸟行状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1973 年的弹子球》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斯普特尼克恋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海边的卡夫卡》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注：以上译本均为林少华所译，所有的出版时间都是该译本出版的已知最早年份）